

环境政治学译丛

全球环境政治： 权力、观点和实践

[美] 罗尼·利普舒茨 著
郭志俊 蔺雪春 译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wer,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译丛
Environ-Politics

全球环境政治： 权力、观点和实践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wer,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美]罗尼·利普舒茨 著
郭志俊 蔺雪春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从我们身边的实际生活切入,从环境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出发,系统阐述了分析当前全球环境政治现象的不同视角、基础框架和常规方法。但就作者个人而言,他无意提供一种解决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案;相反,他试图引起我们对当前各类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质疑,鼓励我们吸收更多的知识。在作者看来,国际制度、市场、科学甚至绿色消费主义,对认知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同样不可或缺,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在“使民主和政治恢复活力的社会活动上采取集体行动”,并尽量发掘政治行动的新形式。否则,我们既不能拯救任何物种、地球,也不能拯救我们自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美)利普舒茨著;郭志俊,蒯雪春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wer,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ISBN 978-7-5607-4567-1

I. ①全… II. ①利…②郭…③蒯…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827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7.75 印张 263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形成中的诸多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



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等



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统一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是自200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的。2005年翻译出版了《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和《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2008年翻译出版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2012年翻译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罗宾·艾克斯利)、《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和公民参与》(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克布)和《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罗尼·利普舒茨)。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作品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展现了“环境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环境政治学整体或某一主要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在最近几年内的连续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欧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规划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09YJA71004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等所提供的主要财政资助。同时,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萨拉·萨卡、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约翰·德赖泽克、罗宾·艾克斯利、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马丁·耶内克和罗尼·利普舒茨等提供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作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刘颖博士、徐凯博士、张淑兰教授、李宏博士、蔺雪春博士、郭晨星博士、侯艳芳博士、郭志俊博士、杨晓燕博士、李慧明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李昕蕾女士等,他们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承担了本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说明

对罗尼·利普舒茨先生的这本著作及学术思想,译者在 2005~2008 年写作博士论文时便有所接触。总的感觉是,广博宏大与深入浅出兼具。他能够把复杂的环境政治思想与我们身边的细微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还能把全球性的视野与地方性的思考相互贯通,从现代市场、社会生活、科学探究中窥见权力政治在国内、国际范围影响自然环境和环境思考与行动的大致图式。

在此有机会将其译成中文呈现给广大读者,并力图使大家理解:环境政治不仅是地方的,也是国际的或全球的。它不仅需要我们思考、质疑,更需要我们有果断性的主张和行动。依此,罗尼·利普舒茨先生的《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一书,可以说是我们深入了解当今世界的环境政治现象与知识、激发环境行动的砥砺之作。

在翻译体例上,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使个别地方可能因此而不太符合中文习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译者还对首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等提供了其英文或母语的拼写。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与本译丛第一辑的处理方式不同,我们没有再将注释中的文献出处信息译成中文,而是保留了其英文样式;二是由于篇幅限制,译者只好忍痛割爱,将文中页末的阐释性注释作了某种省略处理。

最后,此次翻译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蔺雪春博士翻译了前言和第一、二、三章,郭志俊博士翻译了第四、五、六章。最后蔺雪春博士和郭



志俊博士又共同参与了校稿和统稿工作。由于译者的精力、学识有限，定稿中肯定还存在着诸多谬误之处，因此给读者造成的不便，恳请读者见谅并批评指正。

郭志俊 蔺雪春

2011年9月于山东财经大学(筹)、山东工商学院

中译本前言

读者们看到的这本书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那时笔者开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讲授“全球环境政治学”课程。当时,真正适合该课程的教材还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自己撰写一本。公开发表并不是最初确定的目标,但 2000 年以后不久,来自 CQ(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出版社的一名编辑邀请我撰写一本相关教科书。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讲义给她寄过去,她表示喜欢,结果就有了这本书。但问题是,在经过十多年之后,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还依然是切合时代的和有用的呢?尤其在它的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思考这一问题,当然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读者来判断。

《全球环境政治》的撰写基于两个分析框架:批判社会理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前者试图更好地理解各种来自于知识与权力的环境理论观点成为社会抗议与政府政策的基础,并反映了一个社会中权力与等级制的不同形式。后者强调,历史地产生的实践——无论是工业的还是消费的——部分地由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受到同样植根于历史的信念与实践(它们可能是与物质现实相矛盾)的影响而改变。结果是,某些社会团体和国家所行使的权力并不完全是其军事力量、物质财富或所谓的“软实力”的体现,还往往是物质性和意识形态性历史的后果。因而,要想恰当地应对环境问题,仅仅着眼于发明或建议新的政策和引入新的行动方法是不充分的。现实中总是存在着反对变革的利益集团,而很多人不愿意改变其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



或许，对决定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结构过程与力量的更好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充分考虑社会变革阻碍因素和应对环境难题的新方法。

那么，全球环境议题更大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背景是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呢？答案同时是“是”与“否”。国际社会针对正在出现的全球气候变化威胁不断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具体性成果。一段时间以来，对市场机制的依赖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比如碳捕捉。市场机制可以避免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冲突，但它在现实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在世界许多地区，“当地的”行动正日益受到推崇。但是，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将来也有可能回到更严厉的规制政策——把市场机制与柔性强制结合起来。目前这种方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很难说，因为它还依赖于一个至多可以缓慢发生的更宽泛的全球政治变革过程。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一个新版本的话，《全球环境政治》将会在许多方面得到改进。但有些遗憾的是，短期内看来这在英语世界中还难以实现。笔者希望，本书或许在中国的发行与阅读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借此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考虑出版中文的第二版。最后，笔者真诚地欢迎来自读者的任何评论、建议和意见交流。

罗尼·利普舒茨

2011年8月14日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前 言

理查德·金敦(Richard Guindon)在1985年9月17日出版的漫画是我最喜欢的,漫画讲述了两名科学家在实验室认真地工作着,这时他们的一个同事手拿一叠资料冲进来大喊道:“生态系统再次崩溃,我们需要青蛙,更多的青蛙。”生活有时是对艺术的仿效。几年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断消失的青蛙——科学家面临的难题》的文章。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发现:在世界各地的池塘、河流和高山以及雨林中,两栖动物正在不断消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回忆说:“草地上的青蛙曾经像苍蝇一样多,现在却再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谁又能拯救它们呢?

青蛙并不是正在消失的唯一物种。近几年来,许多其他物种(包括动物和植物)也面临灭绝的危险。尽管人类把这归咎于大自然,但在这些事例中人类似乎是应该受谴责的。更糟糕的是,在生物减少的同时,非生物却增多了起来,个人电脑、汽车、纸张、废水、温室气体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能够容纳它们的废物处理场越来越少。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设备数量异乎寻常地激增,就像某些外星侵略者试图征服地球一样。为此,我们能听到科学家的强烈呼吁:“生态系统再次崩溃。电脑!电脑的数量亟须减少!”

如果我们追问,谁能(加黑文字在原著中为斜体,意在强调。全书下同)拯救青蛙(也就是自然)?答案是模糊不定的。他们可能是政府、科学家、企业、消费者、**掌控**系统和各种联盟,并且不同书籍中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些专家，像本书中引用到的比尤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和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就认为，我们的环境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世界是一个环境优美的世界，而且只会变得更好，空气和水会变得更加清洁，生态也会更加健康，资源也会更加廉价。即使有什么差错，经济的增长也会使得青蛙——也就是自然——得到更好的保护。毕竟，富裕的国家已经净化了它们的环境，因为它们负担得起、也有意愿去做。因此，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各国都变得富裕起来。依赖经济增长是更好的方法，意味着人们不必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现实中真正需要的是制造、运送、购买和丢弃更多的商品。但这样不是很奇怪吗？面对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的环境危机，难道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继续做那些一开始就可能导致危机的事情吗？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以金敦为代表的这些科学家，相信科技可以拯救人类。化石燃料不是清洁能源并会产生二氧化碳，但没有这些能源的话我们将无法生存。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燃料，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转型，找到某种替代品。我们已知道怎样利用太阳能，净化煤炭，利用风力发电，开发铀矿，将来某一天还有可能掌握核聚变。这些技术并不会解决我们的环境难题——即使是核聚变也会产生放射性污染，但这却是解决最紧迫的环境难题比如气候变暖的一个较好办法。如果我们已经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可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大自然母亲，我们就应该停止破坏环境，相反我们却没有。许多科学家和无数的智库、公司总裁及政治家，特别是那些与布什政府、美国煤矿和石油公司有关联的人都只是说，还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

许多研究并从事全球环境政治实践的学者、外交家、政策专家都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并不遵守边界限制的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合作性的国际协定及法律来应对。到目前为止，此类制度的数量已数以千计，但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却让人难以恭维。它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协商讨论，而



我们缺乏的恰恰就是时间。外交上毫无进展促动了对新方法的探究。如果政府不能解决环境难题,或许市场可以!我们以前在哪儿听到过这句话?

本书不会为你确证其他人正在有效地应对环境问题,国际谈判将会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企业能够成为“全球好公民”,商业可以“绿化地球”。因为,所有那些确证至多是一种虚弱无力的希望。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成问题的是我们**知道**如何保护环境却不能付诸实践。事实上,只要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行动。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一些信念、实践以及技术来促使我们减少能源使用,降低污染排放,减少鱼类捕获,减少树木砍伐,减少汽车和计算机的生产以及降低婴儿出生率,但我们却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所面临的 these 问题是**政治性的**,对此,即使能设计出更复杂计划的经济学家、发明出更晦涩难懂的技术的科学家以及想象出不具强制力协议的外交家也不能解答。只有当那些变得愤怒的理想主义者政治性地行动起来,试图改变旧的制度并鼓励创建新的制度时,才能拯救环境:**只有借助政治行动,才能拯救环境。**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过于学理化,而且的确如此。在看起来似乎是异常棘手的问题、压倒性的势力以及强势的代理商面前,本书将致力于激励读者采取行动,因为社会本身是不能自行改变的。本书吁求你和有相同思想、希望的其他人一起来“实践政治”。“实践”的意思是指获取有关自然的知识并积极地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恋爱、工作、休闲等各个方面。“政治”并非是指自由市场政治和自由民主政治——它们将任何事情都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指取之于自然与返之于自然相当的**民主政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植根于伦理性“正确”之上的**民主政治**,不把所有的决定、行动都留给遥不可及的代表和机构的民主政治。

因此,为了找到实践新型民主政治的方法,本书不仅提供了一种全球环境政治的理论探索——确定基本议题和阐明核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过度消费,而且还提供了对保护全球环境的常规方法的批判性分析。其目的就是促使教师和学生怀疑性地看待



迄今为止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为此，本书第一章将概述问题的性质、用于探究问题的理论工具和支撑着本书基本观点的哲学立场。在第二章，我将概述关于自然及其保护的相互矛盾的主要哲学观点——合作、竞争、发展、反支配，并讨论这些观点是如何体现在文献和实践之中的。在第三章，笔者审视并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对方法——将污染视为一种外部性并把资源当作生产投入——以及全球化对自然的影响。在第四章，笔者探究了政治行动的动机、原因及它们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些因素。当然，在保护环境、恢复环境方面，国际环境体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在全球环境政治中也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五章提供了对理解环境国际政治的既有方法的描述与分析。最后，鉴于本书的规范性目的以及仅依赖于市场、科学和制度的论点有可能使我们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第六章探讨了政治行动的动机、理由及其可能采取的形式。

国际制度、市场、科学甚至绿色消费主义，它们都是国际社会努力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除非我们组织起来并就旨在使民主和政治恢复活力的社会运动方面采取集体行动，否则我们拯救不了任何物种，拯救不了地球，也拯救不了人类自己。但是，请不要不加批评地接受这本书。而对于那些想学习、吸收更多知识或希望用更中立的分析来缓和本书激烈言辞的人，本书每一章都附有大量的具有相同或相似主题的其他书籍。它们都值得一读。

在许多方面，本书是笔者二十五年来有关环境问题研究的综合之作。我因为在忧思科学家联盟(1978~1979)、马萨诸塞奥杜邦学会(1980)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1981~1983)的短暂经历而对环境开始有所了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课程(1982~1987)，在太平洋环境、发展和安全研究所的创建管理(1987~1990)和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工作的13年，使我对地球的未来增添了更多的批判(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讥讽)、要求和希望。这些知识和态度都在此书中有反映。

没有哪一本书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本书也不例外。在此很难



列出所有以某种方式陪伴着我的人的名字,因为这里边有太多默默的奉献。一个并不完全的名单至少包括肯·康卡(Ken Conca)、里克·戴芒德(Rick Diamond)、彼得·优本(Peter Euben)、玛格丽特·费兹西门(Margaret Fitzsimmons)、卡西林·佛吉(Cathleen Fogel)、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已故的亨利·肯戴尔(Henry Kendall)、盖勃瑞拉·卡汀(Gabriela Kutting)、卡伦·利特芬(Karen Litfin)、迈克尔·曼尼尔兹(Michael Maniates)、朱迪·迈耶(Judith Mayer)、马特·帕特森(Matt Patterson)和杰尼·罗克林(Gene Rochlin)。他们的著述以不同的形式在本书中出现,同时我对那些无法列出的无名英雄心怀感激(当然,我要对所有出现在名单上的人的著述的引用负责)。此外,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约翰·艾格纽(John A. Agnew),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的彼得·哈斯(Peter Haas),查尔斯顿学院的安吉拉·哈法舍(Angela C. Halfacer),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泉分校的帕瑞瑟·卡尔巴彻(Patricia Keilbach),华盛顿大学的卡瑞·利特芬,加拿大约翰·霍华德学会的杰罗德·托马斯(Gerald Thomas),西北大学的耶尔·沃林斯卡尔—纳米尼亚斯(Yael Wolinsky-Nahmias),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的深刻而富有见地的评论与建议。我还想特别感谢安吉拉·麦凯肯(Angela Mccracken)、爱丽丝·弗莱西(Elise Frasier)、查瑞希·金诺(Charisse Kiino)、琼妮·艾斯霍斯(Joanne S. Airsworth)和莎莉·瑞曼(Sally Ryman),他们对本书的编辑给予了各种帮助。最后,我想感谢玛丽(Mary)、迈亚(Maia)和艾瑞克(Eric)多年来对我的耐心、忍让和关爱。

罗尼·利普舒茨

2003年6月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全球环境政治”	(1)
一、香蕉的故事	(1)
二、对香蕉及其他类似事物的思考	(3)
三、社会性的思考	(18)
四、大自然的多重角色	(20)
五、为了地球的制度?	(22)
六、本书的剩余内容	(26)
七、家园即栖息地,栖息地即家园	(31)
延伸阅读	(32)
第二章 解构“全球环境”	(34)
一、绿色思考	(34)
二、哲学、本体论、认识论	(35)
三、解构环境哲学	(44)
四、反对支配:抗拒是富有成效的	(78)
五、一些预先思考	(89)
延伸阅读	(90)
第三章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地球环境	(92)
一、污物与富裕	(92)
二、金钱就是一切!	(94)